

■ 大家印象

林徽因先生对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贡献

林徽因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杰出女性，她身负多重光环，既是诗人和文学家，也是建筑师和建筑史学家，另外在文物保护、工艺美术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林徽因先生是影响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重要人物。她倾尽一生将自己的智慧、才情和热忱投入到与梁思成共同创立的中国近现代建筑事业中，协助梁思成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建筑史学、文物保护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并且对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也有重要的贡献。

与梁思成共同探索中国古建筑保护思想

林徽因从小天资聪颖，“读书皆慧”（其父长民语），13岁进入英国教会办的培华女子中学读书，打下了良好的西学基础，同时又受到家学影响，对传统文化和艺术具有浓厚的兴趣。1921年，18岁的林徽因随父游历欧洲，并在伦敦读书期间受到女房东（一说房东女儿）的启发和影响，决心将来学建筑。回国后，林徽因与梁思成在父辈的属意下开始交往并订下婚约。在林的影响和推动下，梁思成立志以建筑为专业，二人于1924年共同赴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

学成归国后的梁林二人先是一起开开了东北大学建筑系，而后又共同加入了朱自启先生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1931年至1937年，林徽因随梁思成和学社其他同仁完成了几百座古建筑和许多早期石窟造像的调查、测绘和整理研究。1937年佛光大殿的发现，林徽因就是最重要的亲历者之一，正是她察觉到了梁上隐藏的“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等唐代题记，与经幢上的纪年对照后，才确定了在祖国大地上仍留存有唐代木结构古建筑的事实。

这一时期梁思成的研究成果中也包含了林徽因的宝贵心血，比如他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等重要学术著作均有林参与研究、撰写、校对和文字润色。这些成果不仅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梁思成形成“保存现状，恢复原状”这一古建筑保护思想的学术基础。

在林徽因的个人著述中，也可以看出她在保存古物方面始终与梁思成保持相同的观点，而且在表达上更是充满了热烈的感情和文人的情怀。例如她在《平郊建筑杂录》中以非常个性化的语言道出了自己对于“保存古物”的坚持：“原有精美的白石栏杆，已拆下叠成台阶，做游人下池的路。不知趣的，容易伤感的建筑师，看了又一阵心酸……‘保存古物’，在许多人听去当是一句迂腐的废话。‘这年头！这年头！’每个时代都有人在无奈何时，喊着这句话出气。”在《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里，林徽因鲜明地表达了力主保护的立场：“如果我们到了连祖宗传下来的家产都没有能力清理或保护，乃至于让家里的至宝毁坏散失，或竟拿到旧货摊上变卖；这现象却又恰恰证明我们这做子孙的没出息，智力德行已经到了不能堕落的田地。”

除散文随笔外，林徽因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建筑史研究学术文章，在文中十分关注中国古建筑的建筑学价值，并对其有很深入的论述，其洞见远超前时的西方和日本学者。在《清式营造则例》绪论中，林徽因指出中国古建筑在结构、历史和艺术等多方面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林提到“但是这建筑（指中国古建筑）的优点，绝不是在那现成的色彩和雕饰，或特殊之式样上面，却是深藏在那基本的，产生这美观的结构原则里，及中国人的绝对了解控制雕饰的原理上。”正是这种深刻的价值认知激发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保护古建筑的决心，并在后续的不断实践中形成了符合中国古建筑特性的保护思想。

为北京城的保护而鞠躬尽瘁

1949年起，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直积极地为保护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出谋划策，其中林徽因更是为古都北京的保护而大声疾呼，其保护思想先进超前，其至诚精神可敬可嘉。

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两位先生共同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初步建议》（即梁陈方案），表达出“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先进规划理念，这其中也有林徽因倾注的心血和智慧。近年有学者发现《对于巴兰尼克夫先生所建议的“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几个问题”》这份珍贵档案，署名为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其中林的名字在陈之前，足见林徽因在五十年代关于北京城市的未来规划设想中亦有深度参与谋划。根据梁从诫先生的回忆，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北京的规划上提出了一致的观点：第一，现代人具有维护古都原貌的义务，不可为了眼前的方便而轻易“拆旧布新”；第二，反对将北京城“就地改造”，即在老城中进行现代建设，并预见其“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遗憾的是，梁林二位学者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被接受。

为了通过公众重视古都遗迹的保护，五十年代初，林徽因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北京的文章，包括《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我们的首都》等。在梁林合作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他们指出“北京是一个先有计划然后建造的城，它所特有的优点主要就是它那具有计划性的城市的整体”，并明确提出了整体保护的原则性建议，“北京城原有的整体文化特征和多数个别的文物建筑又是必须保存的”。他们认为故宫、坛庙、府邸、苑囿等文物建筑具有群体的价值，不应只着眼于单个建筑的保存。另外，他们还提出“必须强调环境配合”——即注重环境协调的理念。这些观点在当时看来是极具前瞻性的，即使放在今天的文物保护语境下也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该文阐释了北京中轴线这份“伟大的遗产”的特色，因而被认为是对于北京中轴线价值认知的最早论述之一。其实林徽因早在1931年的公开演讲中就已明确提出北京中轴线的重要意义，她曾激情洋溢地说道：“自北而南，存在着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北起钟鼓楼，过景山，穿神武门直达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然后出午门、天安门、正阳门直至永定门，全长8000米。这种全城布局上的整体感和稳定感，引起了西方建筑家和学者的无限赞叹，称之为世界奇观之一。”五十年代梁林对北京中轴线的论述，应是在其学术生涯之初就已具雏形。2011年，北京中轴线正式启动工作，正是对二位学者殷切期望的最好回应。

除了通过学术文章来宣扬保护思想，林徽因也不顾病体，用实际行动来保护北京古城遗迹而极力奔走。1950年，为了保护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梁林二人一起提出了修建城墙公园的设想，但这并没有打动当时的首都建设者。1952年，为了抢救将要被拆除的牌楼，林徽因与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1953年，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的“关于首都古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上，林徽因也开宗明义宣扬保护与新建并不矛盾，不应顾此失彼。她认为，保护古文物建筑是为新建筑的设计提供



1927年2月，林徽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美术学士学位



1949年，与梁思成商讨国徽设计图稿



1936年，在山东测绘洛阳兴隆寺塔

古建筑身上吸取营养，寻觅创作的灵感，感受古老建筑艺术的魅力，提炼其有益的精华，用到新建筑的创作中去。1954年，林徽因拖着沉重的病体参加了北京市举办的讨论天安门前三座门是否拆除的会议，在会上她慷慨陈词，力主保留，并且提出了可行的调整方案，虽然她说服了现场许多代表，但据说因先已得到“必须同意拆除”的通知，最终三座门还是消失在了历史的洪流中。

由于时代的原因，在北京城的建设保护之争中，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并没有赢得当时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从今天来看，他们提出的原则、理念和方案都极具远见，能兼顾古迹保护、协调城市发展，同时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特别符合中国许多古城在保护和发展方面的双重诉求。可以想见，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对中国未来文物保护和发展仍会产生持续的启发和影响。

致力于工艺美术的研究和保护

林徽因先生在工艺美术和非物质手工技艺的保护方面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相关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因其早年在西方学习建筑和舞台美术的学术背景，林徽因回国后一直对中国传统的装饰纹样多有关注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林徽因就在工艺美术设计方面有零星尝试，例如1932年她承担了仁立地毯公司铺面室内外装修及彩画工程的改造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先生更是万分关注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品的保护和传承，并亲力亲为，尝试对其进行复兴。当时由于各种原因，传统工艺品销路不佳，行业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传统技艺面临失传。为了挽救传统工艺，林徽因带领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等人调研了濒临倒闭的景泰蓝、烧瓷、雕漆、地氈等工艺美术厂，提出传统工艺品的保护和复兴应遵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原则。同时，林徽因还发挥了她极高的艺术造诣，设计了一批既适应于时代生活需要也充分利用了原有工艺和材料的新型工艺美术品，如景泰蓝的台灯、装饰挂盘、烧瓷的装饰花瓶等，收获了极佳的社会反响。

另外，她还带领团队将传统纹样融入新的工艺品设计中，制作了敦煌风格的真丝头巾、仿明清缣子花边和刺绣的背心，以及景泰蓝的首饰盒等多种工艺美术纪念品，并将它们捐赠给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国际友人。这不仅带动了北京特种工艺美术的复兴，也为传统的民族装饰纹样注入了新的活力。千禧年以来，我国非遗保护传承和博物馆文创等风潮兴起，其中不少尝试仍效法林徽因先生在50年前的工作模式，由此可见林先生具备了多么超前的视野。

林徽因先生在逝世前的最后几年中，参与了许多重要的传统纹样研究和设计相关的工作。她与梁思成一起承担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并亲自设计了纪念碑基座的花纹雕刻。她带领学生对中国历代装饰图案（包括建筑装饰、各类青铜器玉器、服饰等）进行了多方研究，并计划编纂出版中国的历代图案集，但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实现。另外，她还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写的《中国建筑彩画图案》作序等。

林徽因先生和梁思成先生在思想和精神上高度契合，她毕生帮助梁思成著书立说，一起探索并最终形成符合中国古建筑特性的保护思想。她还全力协助梁思成先生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营造系（即现建筑系），为建筑设计和文物保护事业培养大批接班人。

同时，林徽因先生自己也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知识和精神遗产，她完成了大量的古建筑测绘和研究工作，并且通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积极宣传中国古建筑的特色和价值，努力唤醒公众的保护意识，痛斥破坏文物的短视行为，是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吹哨人。

另外，林徽因首开时代先河，积极承担了建国初期北京传统工艺的复兴工作，还投入大量心血研究中国传统纹样，并将其融入新的设计中。她为美术学院和工艺美术界培养了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等人，促进了中国工艺美术和非遗保护事业的发展。（清源文化遗产）



幽居寺北齐释迦牟尼佛像

2023年2月5日，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国际佛光会创办人星云法师安详离世，享年96岁。2016年4月30日，他曾亲临河北石家庄，出席在河北博物院举行的“星云大师捐赠北齐佛首暨舍利入藏暨一笔书法展开幕仪式”。当天下午4时许，星云大师亲手为修复好的石家庄灵寿北齐幽居寺释迦牟尼佛像揭幕。当红色幕布徐徐拉开，佛首佛身完美合为一体的佛像出现在大家眼前，现场掌声雷动。

北齐幽居寺释迦牟尼佛像，现在河北博物院“曲阳石雕”陈列厅展出。曾经与之一同供奉于幽居寺塔内的一组北齐佛像，也陈列于此。柔和的灯光下，这组大小各异、石质细腻、刻工不凡的造像，看上去精美至极。由此，人们不禁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灵寿幽居寺。

星云大师与幽居寺北齐佛首回归

李立华

千年古刹的前世今生

幽居寺位于石家庄灵寿县砂子洞村，距离县城五十余公里。红墙环绕的寺院，掩映在一片茂密的绿草丛中，颇有些“幽居”的意思。

幽居寺有两通北齐石佛流传后世，立碑时间为北齐天保八年（557）。塔内齐碑为卧式，系《赵郡王高叡修寺颂记碑》，碑文记载并颂扬了高叡与僧人标修建塔的历史。塔外齐碑系《赵郡王高叡修寺碑》，龟趺昂首，浑厚庄严，碑额雕双龙戏珠，跃然有龙腾之势。碑额上部依照北齐寺庙碑的通例凿一佛龕，内浮雕释迦坐像一尊，碑阴上部佛龕浮雕释迦、多宝佛并坐像。根据碑文内容可知，寺院初名“定国寺”，定州僧人标于东魏末年创办。北齐天保七年，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赵郡王高叡为其亡父母、亡伯、亡兄、亡妻及自身功德，选择上好的汉白玉石，敬造了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阿閼佛三尊佛像供奉寺内，并扩建了寺院。高叡为北齐皇室贵胄，经其扩建后的寺院规模更加宏大，殿堂鳞次栉比，成为当时一座名刹。据史料记载，彼时的幽居寺有僧舍二百余间，行僧二千余众居之，寺院香火旺盛，诵经声

为供奉佛像兴建的方形古塔

幽居寺院内外北齐赵郡王高叡为供奉佛像而兴建的塔，是一座方形七级密檐塔，高二十余米。塔身建于简朴的方形台座上，平面约五米见方。整座塔由石灰石砌成，塔体外方内圆，造型简洁，比例适度，坚固朴实。它既不同于汉族传统的楼阁式宝塔，也不同于由印度传入的喇嘛塔（瓶型塔），既自成一统又别具一格，堪称我国方形古塔中的珍品。

放眼望去，幽居寺塔的造型非常独特，各层塔檐只用很少的叠涩，主要是以方砖一角逐层挑出，呈堆砌莲瓣状。塔身逐层上收，塔檐出挑也逐层减少，一至三层各出挑六层莲瓣，四、五两层各出五层，第六层挑出四角莲瓣，最上面的第七层只挑出三层莲瓣，各层塔檐上部以反叠涩上收。通俗地说，幽居寺塔的塔檐造型巧妙利用了长方砖的一角，把砖斜45度摆放，每块砖只露出一角，由此形成90度的尖角造型，通过五层叠涩形

星云大师促成佛首回归

20世纪90年代，由于地处偏远、条件简陋，犯罪分子无情地将塔内三尊大佛的佛头割下，连同北齐卧碑部分、砖塔石门楣、石经幢等文物盗走。灵寿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两个月后案件告破，抓获犯罪分子20多名，追回北齐卧碑部分、砖塔石门楣、石经幢三件文物。然而，包括佛首在内的其他文物，却被贩卖到了大陆以外地区，不知所踪。1997年以后，灵寿县文物部门将幽居寺塔内外的石刻文物，凡能搬动者，全部运到河北省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前身）保管。2013年6月，河北博物院新馆开馆试运行，原在幽居寺塔内供奉的释迦牟尼佛佛身、无量寿佛佛身、阿閼佛佛身，在“曲阳石雕”陈列展出。

2014年初，两位佛教信众找到台湾佛光山佛馆馆长如常法师，希望把一尊辗转来自大陆的北齐汉白玉释迦牟尼佛首捐赠给佛光山。如常法师及时告知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在接受信众捐赠的这尊佛首后，星云大师痛心于佛首身首分离，发愿将佛首无偿捐回大陆，让佛像“金身合璧”。星云大师专程派员到北京，与国家文物局取得联系。国家文物局立即开展线索搜集，组织专家从材质、年代、体量、审美等全方位比对鉴定，发现该佛首造像与河北灵寿幽居寺塔内的释迦牟尼佛身造像相吻合。



幽居寺三尊大型北齐汉白玉佛像



灵寿幽居寺塔

不断，可谓盛况空前。

北齐是个尚佛的王朝，曾有佛教寺院4万多所，人口2000多万的国家，僧尼最多时达到200多万人，在短短28年时间里，创造出中国石窟艺术的辉煌，在河北南北响堂水浴寺、娲皇宫留下了大量佛教雕刻艺术珍品。可惜的是，北齐这个短命王朝仅仅存在了28年。随着北齐灭亡，定国寺也逐渐荒寂。元代时，塔和寺院得到重修，又曾兴盛一时。彼时，定国寺更名为祁林院，并有两通元代石碑保留下来，一通为大德五年（1301）的《大元历代圣旨恩惠抚恤之碑》，一通为大德六年（1302）的《祁林院圣旨碑》。但是，幽居寺之名究竟形成于哪朝哪代，至今尚无从考证。有人猜测，可能是后人根据寺内北齐石碑上“居之口幽，登之乃灵”的文字而命名。

到了清代，幽居寺被完全废弃，规模宏大的殿堂建筑均已不存，砖塔成为寺院内唯一的建筑。塔内及周边幸存的文物共计经幢1座、石碑4通、石造像21尊，成为这座千年古寺风光一时的历史见证。

成塔檐。这种简洁朴素中求变的砌筑手法，俗称“棱角牙子”。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只通过一个小小的变动就能让呆板的直线形成曲折变化，堪称灵活应用青砖的早期范例。

幽居寺塔南面辟有半圆形石拱门。资料显示，石拱门的门框原本由整条石材雕琢而成，边框及门楣上遍布线刻的莲花花生童子、云龙、金翅鸟及忍冬等纹饰，周边装饰有波斯纹样，疑似北齐遗迹。遗憾的是，石拱门上的石雕纹饰如今已看不到了。极目仰望，塔的刹部非常大气。八角形须弥座，每面两个壶门之上八瓣莲叶，蕉叶之中再置一层八角须弥座，座上覆莲座上置仰莲座，最上面是宝珠刹顶。由此印证了唐及以前的古塔都很重视塔刹，往往是不厌其烦地复杂，宋以后才逐渐简化。自第二层以上，塔每层的高度依次递减，外部轮廓也逐渐内缩，使塔体外形呈方锥形，显得优雅简约。

2015年5月23日，佛首造像捐赠仪式在台湾佛光山举行，随后，向台湾民众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展示，有近500万民众瞻仰了这尊佛像。2016年3月1日，佛首造像回归仪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并公开展出。两周后，佛首造像从北京运抵石家庄，经技术人员精心修复，终于在河北博物院与公众见面。这尊来历非凡的佛像，位于三尊大型汉白玉佛像正中，佛首梳低平肉髻，面相浑圆，眉眼细长，双目垂睑下视，鼻直翼宽，丰唇厚耳，仿佛从未经历过身首分离的大灾大难。北齐赵郡王高叡敬造的三尊大型汉白玉佛像均有明确纪年，为研究北齐佛教及佛像造像艺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由此可见，这组精雕细刻的佛像，是代表北齐皇家审美和技艺的御制造像，代表了北齐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

当年，在河北博物院举办的捐赠仪式上，星云大师激动地说，佛首是信徒捐赠的，这尊佛首好美，虽然费尽周折，佛首终于回家了。他认为佛首回归，为流落在海外其他文物的回归，开创了一种很好的方式，要让全世界的华人都知道，佛首和佛身是不能被阻隔的，就像海水隔不断了两岸的文化、历史和血缘关系。全球华人同宗同源，他希望两岸及各地华人像这尊身首合一的佛像一样，找到自己的根。